

浅析“南方谈话”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影响

——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下

林一斋

【摘要】笔者认为“南方谈话”着眼于战略层面,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方向,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在国内层面,南方谈话开启了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并作为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最终在经济层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在国际层面,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外交上,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逐步展开,其效果也开始呈现,中国经济外交也随之表现出新的特点。

【关键词】“南方谈话”;经济外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0X(2012)05-0058-04

所谓“南方谈话”,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深圳、上海、珠海等地,并发表的重要讲话。讲话主要分析国际与国内形势,并讨论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在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辨析了经济体制与国家性质之间的关系,最后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应该发展的趋势。通过发展并深化体制层面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制度改革,通过发展科技和教育为经济建设实现有效的人力与物力支持,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共产党领导实现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通常说来,国内政策的变革很可能引起对外政策的变化,其中程度取决于国内变革的剧烈性。南方谈话以及而后的体制改革都冲击了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的争论。可见,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变改对民众的经济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冲击,并对外交政策造成了影响。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部分,也随着外交政策的变化发生转变。那么,南方谈话作为这一系列改革的开端,其选择在彼时彼刻背景原因是什么?对中国经济外交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具体的政策实践又如何表现?这些便是该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背景原因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一系列具有导向性的讲话，最终推动改革开放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这个选择的原因有二：

第一，从国际层面上看，世界格局出现体系内的变化，许多原本隐藏在两极对抗局面下的问题开始浮现，导致了重要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各国对外政策发生巨大变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以及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波兰等国家发生了政权和国家性质均得到改变的重大历史事件。1991年，苏联在经历了“八·九”事件后仍无法保持联盟的治理，最终实现解体。自此，冷战以来的两极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1972年为抵制苏联霸权主义，中美开始互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美关系开始冷化。彼时，中国的互往对象更多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邻国，因此，为求在国际互往过程中发展并扩大比较优势而取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得不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增长并扩大比较优势。

第二，从国内层面上看，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内政治风波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急需强有力的改革改变国内社会的现状。“南方谈话”及其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属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但是从经济体制的方面看又是一次转折。早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确立了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进行新的讨论。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一系列出口和特区建设政策依旧给中国带来非常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领导集体并未真正认识到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不相容问题，政府依旧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低竞争性带来的无效率生产。1980—1988年的中国年均

增长保持在约为10.5%的水平，但是到了198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为4.1%，1990年为3.8%，到了1991年逐渐回升，但也仅为9.2%。

正是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原因，中国必须进行体制上的变革来求得自身的发展，而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为一体，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为一体”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成并固化。能否在思想上进行转变，对于后来政策的制定与转折是十分关切的。南方谈话正是要在思想观念上首先进行转变，然后推动理论指导的转变，最后带来制度上的变迁。

二、经济外交实践上的影响

所谓经济外交，一般来说有两个含义：一、以实现经济目标为目的，以外交谈判作为手段的外交活动；二、以实现政治目标为目的，以经济作为外交的手段，谋求国家在国际问题上获得的支持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对于中国的经济外交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年份：一个是1978年，另一个是1992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表明中国想要转变的意图，即从之前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国内阶级斗争和大生产战略转为打开国门，走向世界。1978年也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元年”，从此，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体系中拥有独立的地位和身份^[2]。如同1978年在中国经济外交上的意义一样，1992年同样也是重要的年份。1992年，邓小平进行“南方谈话”，最终使得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得以进行，为开展经济外交奠定了基础。如果说1978年至1991年期间，经济外交仅具有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意味，那么，到了1992年“市场经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的时候，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外交已经步入制度化与机制化的轨道了”^[3]。尽管1978年和1992年都是改革开放政策中相当重要的“浓墨”，但是其所具有的意义各不相同，对于中国经济外交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来说，“南方谈话”及其带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外交实践的影响既有其延续性的一面，又有其转折性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贸易方面，“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外交具备两个特点：一方面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另一方面，通过经济

体制的改革为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提供国内的制度保障。出口导向战略的目的是扩大对外贸易，丰富出口产品的种类，最终推动工业甚至经济的总体发展。这种贸易战略着眼于出口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然后组织产品出口，以代替原先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采取这种贸易战略的目的是为国内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规模，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本。1979年，在《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强调扩大地方企业的外贸特权，鼓励增加出口，建设出口特区。1994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一致的国家政策待遇，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市场化下利润和亏损的自得自负，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进行联系和合作以及建立适用于国际规则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实行这个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将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最终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为国家发展筹集资本。然而，一个国家的贸易战略是否能奏效，不仅涉及到实施战略的时机，还涉及到国家是否能融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只有国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才能避免在进行贸易时被他国差别对待，获得一个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因此，1986年7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正式提出申请，旨在恢复其缔约国身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身份对于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可以使中国产品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和世界各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使出口产品不受歧视性待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建立正常的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渠道，减少贸易纠纷和贸易损失；及时获得世界经贸信息，加速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育等。”^[4]1992年南方谈话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奠定国内经济基础，同时致力于满足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关于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1995年，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中国理所当然地将经济外交的重心转移到加入世贸组织上来。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示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心（包括削减关税，取消进口调节税等）。2001年7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经济外交表现为发展并

扩大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获取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本，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基础，使中国能享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通过国际贸易推动经济发展，为后来中国在与东南亚联盟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在国际援助方面，中国一直声称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对贫困国家进行援助。那么，是否不应当将中国的对外援助纳入经济外交的范畴呢？某种对外政策是否属于经济外交，取决于这种对外手段是否具有经济属性，并且能对他国最终形成一种影响或强制能力。从对被援助国的约束程度上来说，国际援助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具有明确政治交换意味的援助，即援助国在进行经济或技术援助的同时，获得被援助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甚至是形成一种政治经济同盟；另一种则是具有潜藏性的获取政治认同和国际认同的援助，即援助国在进行援助的时候，并不强调政治经济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增强国家在被援助国中的软实力，从而提高国际认同度。可见，国际援助具备了经济外交的标准，也应纳入经济外交的讨论范畴之中。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在对外援助的“度”上的把握不足，中国的援助政策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处于经济落后的状态，但是对外援助的规模却不断扩大。1949年10月到1957年底，中国的对外援助数额为21亿人民币，无偿援助占其中的95%，相比而言，1952到195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389亿元。1973年中，签订的对外援助协议总额达到57.9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较上年仅增长202.8亿元。1971至1975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社会经济困难，其对外援助的金额不减反增，“援助金额达230.33亿元，合111.33亿美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5.88%。”^[5]该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数额总额仅742亿元。至1978年，中国援越总额达200亿美元，援阿尔巴尼亚总额达100多亿人民币，而从收益上来看，这些经济外交也并不是成功的，甚至在政治上扶植了潜在的对手。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对外援助政策开始重视

其经济功能与效果，并对于经济援助项目的惯例体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讲究“量力而行”。总的来说，就是对外援助的战略路线不变，但是具体的方针要进行完善。1980至1981年期间，对外援助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0.6%。1983年，国务院总理在访问非洲国家时宣布“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

在1992年以前，中国的对外援助要么完全追求政治认同，忽略经济上的收效；要么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对外援助的战略定位错误，虽然促进经济、技术和人力多种援助方式的发展，但是却难以满足计划中的政治诉求，其最终都难以实现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平衡。1992年成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新的转折。从建国到1978年是一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一个阶段，而1992年以后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如上文所述，在1992年以前，对外援助并非作为一个经济外交的手段存在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之中。严格说来，这是一个不成体系的对外政策，其功能也仅限于单一的经济或者政治收益。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新的观念进入中国，也带来对于旧有理论的新认识，并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对外援助”这一政策的把握，影响到了对其的战略定位。1996年5月，江泽民宣布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五点原则，“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5]中国国际援助政策的由1978年后的“经济定位”的层面（刻意避而不谈政治诉求）上升到了建立“朋友式”的合作，以及强调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明面上的政治层面。对于对外援助的重新定位，既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新的理解，也是将经济外交纳入机制化的轨道上的一个不可跳过的步骤。

结语

国际格局的剧变，既导致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发生程度不一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暴露其在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南方谈话正是

在此背景下诞生的。1992年后，中国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借此改变原本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社会经济结构，使中国最终得以融入世界。融入世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对于中国来说，要进入这个世界，经济外交有其不可小觑的力量。因为无论是国与国的合作，还是区域之间的合作，最基础的也便是经济上的互通有无。这呈现为一种历史趋势：即通过经济来促进文化的理解，最后推动政治上的沟通与合作。正视历史，尊重规律，也正是年轻的中国外交需要学习的真理。

同时，南方谈话作为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其意义既在于继承，又在于创新。这在具体政策上的表现是其既具有延续性，又具有变革性。称其具有“变革性”，是因为南方谈话在历史上最显性的表现是“转折点”，它带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这个转折同时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它并没有否定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各项政策制度，反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肯定和发展，作为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它这种“必然性”来源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也来源于商品经济和出口特区的试验已经显现一定的成果，而经济外交也受到了这种“变革与延续”的作用力影响，被推上中国外交的舞台。

〔参考文献〕

- [1] 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68.
- [2] 赵可金. 经济外交的兴起：内涵、机制与趋势 [J]. 教学与研究，2011(1).
- [3] 崔绍忠. 论中国经济外交 [J]. 思想战线，2012(1)：80.
- [4] 徐滇庆，李瑞.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79.
- [5] 杨鸿玺. 中国对外援助的回顾与发展 [J]. 学习月刊，2009(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